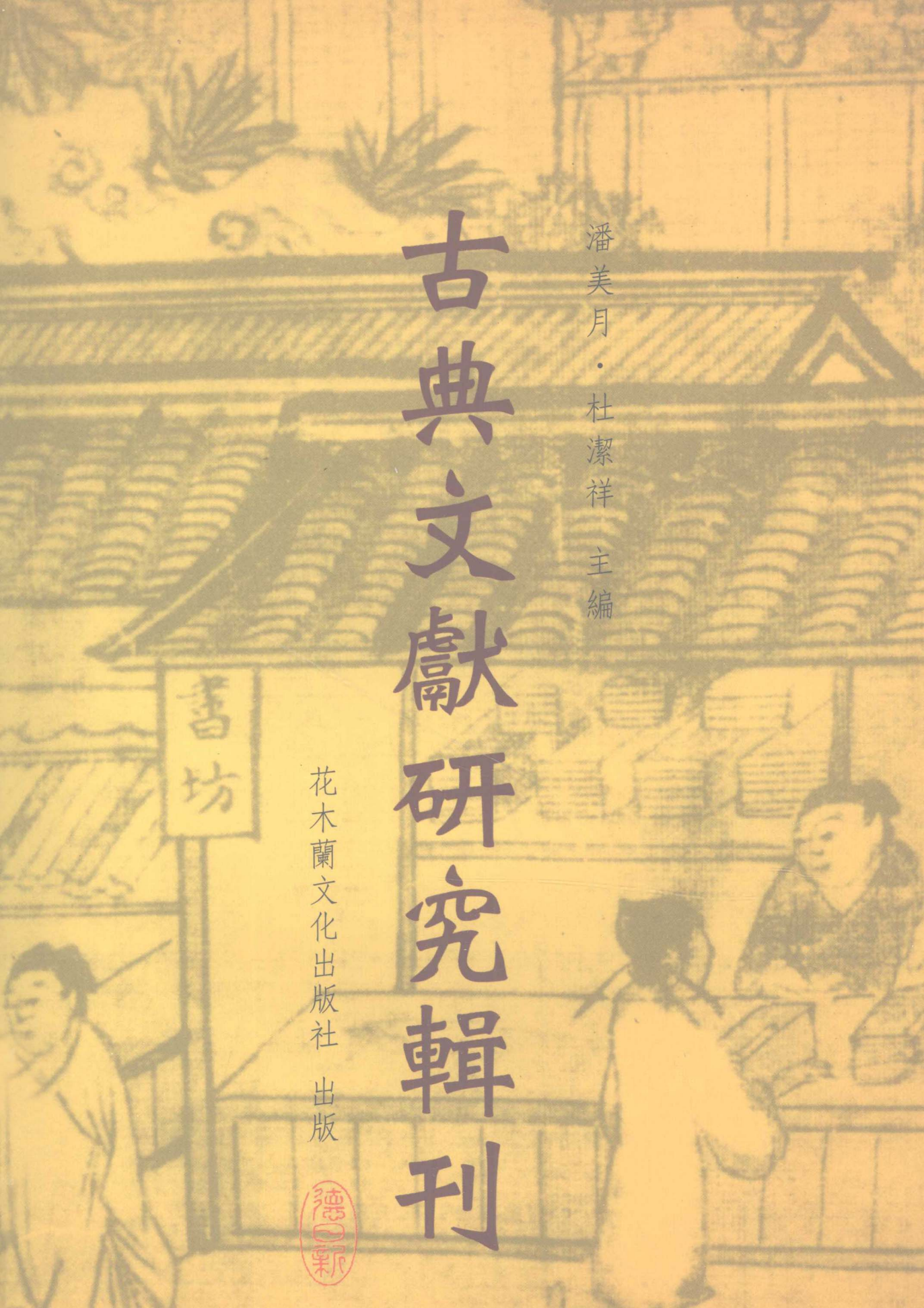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六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9冊

張岱《四書遇》研究

簡瑞銓 著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六編 第九冊

ISBN : 978-986-6657-07-8

張岱《四書遇》研究

作 者 簡瑞銓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市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8年3月

定 價 六編 30冊（精裝）新台幣 46,5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張岱《四書遇》研究

簡瑞銓 著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簡瑞銓，男。生於民國 55 年 10 月，台灣·南投人。畢業於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學術領域為四書學、易經與佛學。目前任教於亞洲大學，課餘並致力於心靈淨化工作之推展。

提 要

張岱（1597～1680 年）字宗子，又字石公，號陶庵，又號蝶庵居士，明神宗萬曆二十五年（1597）八月出生於浙江山陰縣。學問廣博，著述宏富，前半生，繁華綉麗，浪漫多姿；明亡後，砥志厲節，隱居不仕，默默以終。從本論文對其僅存的經學著作《四書遇》的探討，可知張岱亦是一位力主經世致用的經學家，其思想主要是服膺儒家思想，以陽明心學為實踐軸心，並將之落實於自己的日常生活，貫穿於自己的生命歷程與著作的一位經學家。

我們把張岱的《四書遇》放在《四書》學詮釋史的脈絡中來看，其顯現出的價值與文化意義主要有五點：

- （一）在義理上，展現以陽明心學詮釋《四書》之成果與面貌。
- （二）在治學方法與態度上，特種實踐精神，表達出知識份子實現儒家傳統「內聖外王」的願望與途徑。
- （三）在學風上，反映當代《四書》學之新面貌。
- （四）在詮釋方式上，呈現活潑多采的經典詮釋方式與詮釋平民化之傾向。
- （五）在內容上，保留彙整晚明陽明後學的《四書》見解，並突顯個人風格特色。

綜上所論《四書遇》體現了陽明學注經的面貌，匯聚了陽明學者詮釋《四書》的總成果，反映了當代的經學風氣，突顯了自己的著作風格。其所建構的無非是想建立以實踐道德精神為導向的《四書》學著作，響應當代通經致用的風氣，引領學風。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	1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二、歷來研究成果回顧	7
三、研究方法與範圍	11
第二節 晚明《四書》學的新面貌	13
一、宗王反朱的態度	14
(一) 反對《四書集注》之版本體例	15
(二) 不滿《四書集注》之註解內容	17
(三) 義理上以陽明心學取代程朱理學	18
二、自由解釋的學風	20
三、三教合流的傾向	24
(一) 著作呈現三教合流之傾向	27
(二) 以佛解經	29
第二章 張岱家世、生平與著作	35
第一節 張岱生平考述	35
一、書香門第、宦宦世家	35
二、繁華靡麗、過眼皆空	38
(一) 明亡前，園林詩酒，服食奢侈	38
(二) 明亡後，布衣蔬食，常至斷炊	41
第二節 張岱與佛教因緣	45
一、家族多人學佛	45
二、參禪注經、惜福拜懺	46

三、朝山禮佛、戒殺放生	49
第三節 學識淵博、著述宏富	51
一、經 部	53
二、史 部	54
三、子 部	57
四、集 部	59
第三章 張岱《四書遇》的成書與詮釋方式	65
第一節 《四書遇》的成書	65
一、撰著動機	66
(一) 不滿朱註與時文講章而欲有所建立	66
(二) 希望為繼承家學而盡心	68
(三) 為保存晚明陽明學者詮釋《四書》學之 見解	69
二、成書經過	69
三、刊刻及版本流傳	71
(一) 抄稿本的發現	71
(二) 點校本的印行	72
第二節 自由解放的詮釋方式	74
一、以「己心」解經	74
二、以經解經	75
(一) 以本經之文前後互解	76
(二) 以《四書》經文互解	77
(三) 以他經解《四書》	77
三、以史解經	78
(一) 以當代史事解經	78
(二) 以後代史事解經	79
(三) 引歷史人物典故解經	79
(四) 引歷代典章制度解經	80
四、以諸子解經	80
(一) 援引歷代諸子著作解經	81
(二) 援引當代學者之言論或著作解經	81
五、以文集解經	82
六、以佛、道解經	83
七、以文解經	83
(一) 品評文字	84

(二) 詮釋語氣	85
(三) 綜論章旨	85
(四) 詮釋文法	85
八、以小說、俗諺解經	86
(一) 引小說詮釋經文	86
(二) 引俗諺詮釋經文	86
第四章 張岱《四書遇》的義理內涵	89
第一節 大人之學在明明德	89
一、本乎心，原於天，包乎四海，上下明德也	90
二、格物即格心	92
三、聖人用財不為財用	97
第二節 行到恰好處即是中庸	100
一、「中」不離日用，不可執著	100
二、至誠與天地同體	103
三、千古聖學惟有小心而已	104
四、時仁則仁、時義則義	109
第三節 《論語》克己復禮為仁	113
一、「己」「禮」非一非二	113
(一)「禮」即是「天理」	114
(二)脩禮盡敬禮之用	115
(三)禮得「中」則治，失「中」則亂	117
二、仁者義之體，義者仁之用	118
(一)萬物一體之心為「仁」	118
(二)收視反聽、謹言慎動	119
(三)「義」者本心之當為	123
三、「學」重本源	124
(一)君子之深造必以道	125
(二)學者工夫亦盡用逆	128
第四節 《孟子》一書無非說仁義道性善	130
一、無善無惡是謂至善	130
二、養氣者養心，知言者知心	134
三、聖賢之學，必審於時務	139
第五節 小 結	145
第五章 《四書遇》的內容特色	147
第一節 寄託個人胸懷與經世志向	147

一、知我其天，不向人間索知己	147
二、擔當世界，志在補天	150
第二節 彰顯實踐精神	155
一、工夫全在自己爲大人	155
二、《學》《庸》俱經世之書	161
第三節 蘊含博學傾向	165
一、引證廣博、融會貫通	165
二、彙整保存當代眾說	167
三、兼採備錄、不囿陳說	172
第四節 充滿文學色彩	174
一、品評經文	174
二、注文呈現文學之美	176
(一) 敘事說理簡潔精練	176
(二) 修辭典雅短雋有味	178
第六章 陽明學說對《四書遇》的影響	181
第一節 承襲陽明論學觀點與態度	181
一、遵循陽明對《大學》改本之看法與儒家人物之評價	182
(一) 直截痛快，不必補傳	182
(二) 孟子生平立言不甚拘泥	183
二、承襲陽明治學的目的與態度	186
(一) 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	186
(二) 擔荷乾坤、仔肩宇宙	187
第二節 以「陽明心學」爲詮釋《四書》的思想基礎	190
一、世界有缺陷，即是此心不曾圓滿	190
(一) 心即理	190
(二) 心之本體即是至善，即是天理	192
(三) 萬物一體觀	193
二、知之即爲行也	194
三、聖賢教人，只在心上作工夫	195
第三節《四書遇》援引陽明見解	199
一、爲學大病在好名	199
二、君子之學，務求在己	200
三、看破生死，夭壽不二	201

第七章 《四書遇》與晚明《四書》學的關係	205
第一節 《四書遇》對朱子學的態度	205
一、反對《四書集注》改本	206
二、朱註未明，特為拈出	207
(一) 補朱註之未明	207
(二) 斷句與朱註不同	208
(三) 見解與朱註相異	209
三、以「致良知」代「即物窮理」	210
第二節 《四書遇》充滿自由解釋的學風	211
一、詮釋的濫觴	211
二、《四書遇》所呈現自由解釋風氣的情形	213
(一) 形式自由解放	214
(二) 內容自出手眼	215
第三節 《四書遇》所呈現「三教合流」的樣貌	219
一、詞彙、經文與典故的引用	219
(一) 「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詞彙的引用	219
(二) 「盲人摸象」——經文、典故的引用	220
二、修行功夫、人物與觀念的比擬	222
(一) 禪學在掃，聖學在脫，總一機鋒	222
(二) 孔子是佛，子貢是菩薩	223
(三) 夫子安信懷，是不住色相布施	224
三、義理之會通	224
第八章 結論——張岱《四書遇》在《四書》學史上的意義	229
一、在義理上，展現以陽明心學詮釋《四書》之成果與面貌	230
二、在治學方法與態度上，特種實踐精神，表達出知識份子實現儒家傳統「內聖外王」的願望與途徑	230
三、在學風上，反映當代《四書》學之新面貌	231
四、在詮釋方式上，呈現活潑多采的經典詮釋方式與詮釋平民化之傾向	233
五、在內容上，保留彙整晚明陽明後學的《四書》見解，並能突顯個人風格特色	234
主要參考書目	239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四書》對明代知識份子來說，可說是最重要的一部典籍。就生活物質層面來講，知識分子研讀《四書》，透過科舉考試，可以入仕為官，生活前途獲得出路與保障；就生命的精神面來講，知識份子透過《四書》的理解，不論是程朱的「主敬窮理」，還是陽明的「致良知」，由此知道「作聖之功」，人人皆可「居仁由義」而成德成聖。前者於是產生了專為科舉功名而詮釋《四書》的時文講章之作；後者則成為學術主流，產生了許多宗朱或宗王的《四書》學著作。

這些經學主流的《四書》學著作，依時代來分，明中葉以前率皆是宗朱的《四書》作品。代表作如蔡清《四書蒙引》、呂柟《四書因問》等，皆奉程朱之學為圭臬。但是由於朱子的《四書集注》自元、明以來成為科舉考試定本，朱子學成為官方正統意識形態後〔註 1〕，通過科舉考試與官方的提倡，這些宗朱的著作基本上籠罩在朱子《四書集注》之下，多為朱子學的發揮而少有新意。漸漸的，士大夫溺於訓詁詞章之學，程朱學說則被當成獵取名利的工具。更甚者，乃至轉相抄襲產生許多因襲剽竊之作〔註 2〕，導致經義學問漸至荒疏，朱學逐漸僵化，知識份子對聖學的講

〔註 1〕 如容肇祖先生說：「明初尊崇朱學，所定考試制度，及永樂敕撰的《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幾乎是要把讀書人的思想，統治在程朱學之下。」見氏著：《明代思想史》（臺北：台灣開明書店，1982年7月），頁34。

〔註 2〕 如陳琛《四書淺說》乃合蔡清《四書蒙引》、林希元《四書存疑》而成；管大勳《四書三說》也是折衷蔡、林二書以為己意；王守誠《四書傳三義》輯《四書蒙引》、《四

求，墮落為對功名利祿的追求。此種學術面貌到了明中葉王陽明的「心學」盛行後，才有所改變。陽明在〈稽山書院尊經閣記〉一文中說：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偽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互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註3）

這一篇文章可說揭示了陽明的經學觀，亦即「六經皆心學」的觀點，而這一觀點，隨著陽明心學的盛行，提倡以自我良知為中心，重視個人良知的展現和自我人格的完成，於是晚明儒家經典的詮釋有了新的風貌，即是揚棄程朱的學說而產生了大量以「陽明心學」為思想基礎來詮釋《四書》的「宗王」著作。（註4）如李卓吾的《四書評》、管志道的《論語訂釋》及《孟義訂測》、焦竑的《焦氏四書講錄》、周汝登的《四書宗旨》、楊起元的《四書眼評》、葛寅亮的《四書湖南講》、周宗建的《論語商》、

書存疑》、《四書淺說》三書而成。

〔註3〕 見王陽明：《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卷7，頁254。

〔註4〕 這種現象表現在對《四書》的詮釋上最為明顯，蓋明人于儒家經典特種《四書》，其原因有二：一是學人往往就《四書》以講學，尤其是以《大學》架構規模，演成學說；二是「明代儒生以時文為重，時文以四書為重」。語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書人物考提要》。

劉宗周的《論語學案》及《孔孟合璧》、袁黃的《四書訓兒說》及《四書刪正》、王肯堂的《論語義府》、張鼐的《四書演》、周宗建的《論語商》、張岱的《四書遇》等等蔚為一股風潮。但是由於清初學者將亡國罪名歸咎於陽明後學之空言誤國，如王夫之說：

姚江王氏始出焉，則以其所得於佛老者，殆攀是篇〈中庸〉以為證據。其為妄也既莫之窮詰，而其失之皎然易見者，則但取經中片句隻字與彼相似者，以為文過之媒。至於全書之義，詳略相因，巨細靈畢，一以貫之……迨其徒二王、錢、羅之流，恬不知恥，而竊佛老之土苴以相附會，則害愈烈，而人心之壞，世道之否，莫不由之矣。〔註5〕

此外，王夫之又責「王學」之末，喪盡廉恥，忘及君父，他說：

王氏之學，一傳而為王畿，再傳而為李贄。無忌憚之教立，而廉恥喪，盜賊興。……故君父可以不恤，名義可以不顧，陸子靜出而宋亡，其流禍一也。〔註6〕

最後一句，暗指「王學」斷送明代天下之意；若不明說，也是為避清政府之諱。顧炎武更憤激，斥責陽明破壞學風：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談；王介甫（安石）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諸正；豈不在後賢乎？〔註7〕

於是，陽明心學由「異端」而得亡國的罪名。其實，專制政權的崩潰，與其政體本身的缺點，有切實關係。明朝末年，內憂外患，國勢日危，這與朝廷用人不當，信人不足，是不可分的。細讀《明儒學案》之「東林學案」與「畿山學案」即可知。明神宗（萬曆）懶於理事，明思宗（崇禎）心有餘而才力皆不足。明朝自始而終，寧信宦官而不信忠臣，其滅亡是在人意料之內的。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不只是分析與批判專制政權的著作，也可說是解釋歷代興亡（包括明代）的借鏡。將明亡歸罪於「王學」，是簡單化歷史。誠如余英時先生所說：「中國人以往評論歷史，常在有意無意之間過高地估計了思想的作用，特別是在追究禍亂的責任的時候。因此，五胡亂華之禍要歸咎於魏晉清談，明朝之亡國則諉過於『空言心性』，甚至所謂『洪、楊之亂』也要漢學考證來負責。這種觀點一直到今天還流動在許多人的歷史判斷之

〔註5〕 見王夫之：《禮記章句》（下）（臺北：廣文書局，1977年）卷31，頁1136。

〔註6〕 見王夫之：《張子正蒙注》（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4月）卷9，頁282。

〔註7〕 見顧炎武：《日知錄集釋》（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4月）卷18，頁439。

原书缺页

評可說給以王學極低之評價，更遑論以陽明心學注經之著作。以《四書》學的角度來看，從《新集四書註解群書提要附古今四書總目》（註12）中，剔除掉舉業參考書的著作後，以陽明心學注經的作品數量還是頗有可觀，其質量皆不容小覷。學者如能超越顧、王等人的看法，卸下對王學的成見，當可發現其實陽明心學最可貴者乃在於心性修養功夫論方面，這是傳統儒學所最欠缺者。陽明所提倡的「致良知」，表達的就是不忍世風日下、儒學淪落為功利之具，希望藉由心學的實踐，力挽狂瀾、提振人心，「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的方法與主張。（註13）黃宗羲即慧眼獨具的指出：「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註14）

如今《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禁毀書叢刊》相繼刊印出版，以及由國立編譯館主編的《新集四書註解群書提要附古今四書總目》，使得吾人現在能大量探討陽明學的《四書》面貌，且近年張岱《四書遇》的發現及出版，尤為可喜。然而目前學界對這些陽明學者的《四書》學著作的探討尚屬缺乏，而有關張岱《四書遇》的探討則更為稀少。因此本文擬直接從張岱《四書遇》著手，探討「宗王」《四書》學之面貌，與陽明學說對張岱在詮釋《四書》時的影響，以幫助吾人瞭解陽明學說對當代《四書》學的影響面貌及深度、意義與價值。

筆者選擇《四書遇》為研究題目有兩個意義：第一點，從《四書》學史的脈絡來看，筆者在攻讀碩士期間，研究晚明以禪解經的新《四書》學著作《四書滴益解》以及十數年親身實踐心性之學所知，愚以為陽明「致良知」學說乃最能直接孔、顏心法者，然而陽明並沒有直接完整之《四書》詮釋作品。張岱《四書遇》則彙整了晚明陽明學者對《四書》義理實踐、體悟的精要見解，可提供呈現此時期之實證心學之方法、過程與結果。這對有志實踐儒家「內聖外王」之學者可說是值得研究取資的典籍。從《四書遇》所編纂的注文中，最能看出晚明《四書》學的發展狀況，但目前未有以此為學位論文的研究專著。

另外就圖書文獻學的角度來看，「《四書遇》不僅為我們深入研究，全面考察張岱，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資料，還由於該書的旁證博引、廣採眾說，而給明季學者及其著作，提供校勘、辨訛、考證的依據。就《四書遇》所引語錄涉及的二百

（註12）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收藏許多由日本傳回的晚明《四書》學著作，國立編譯館並將之編成《新集四書註解群書提要附古今四書總目》（上、下）（臺北：華泰文化公司，2000年5月）一書，以供學人檢索。

（註13）見王陽明：《王陽明全集》，〈年譜〉五十六歲，正月條，頁1304。

（註14）見黃宗羲：《明儒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年）卷10，〈姚江學案序〉，頁179。

六十七人中，除去唐宋元明著名學者及有著作傳世的人而外，有不少張岱同時代人，得賴此書以傳世。就所引證的典籍來說，亦可作考證、校勘、辨訛之資。」

〔註15〕

第二點，從張岱個人思想研究來看，自來學界只知張岱是文學家、史學家，不知他亦是經學家。張岱的治學態度就如王船山所說：「夫讀書將以何為哉？辨其大義，以立修己治人之體也；察其微言，以善精義入神之用也。乃善讀者，有得於心而證之以書者，鮮矣。」〔註16〕然而「像張岱這樣一位本應在中國史學史、文藝理論批評史乃至哲學史上都占一席之地的重要人物，過去因受材料的限制，特別是其煌煌巨著《石匱書》及《史闕》、《四書遇》等長期以來密鎖深藏，鮮為人知，他作為史學家和經學家的地位一直被淹沒，一般僅在《中國文學史》中作為『明末小品文作家』略為提及，為人知曉。」〔註17〕

由於對張岱經學著作研究的缺乏，導致一般人容易有這樣印象式的批評：「（張岱）他也治經學，撰《明易》、《四書遇》等論著，對程朱理學批判嘲諷尤力；但總體言之，未能在李贄、三袁等人之外別樹旗幟。所可喜者是他善於從日常生理中的人情事裡戳破道學的虛假窠人，用今日的話是頗具內出血效應。」〔註18〕或想當然的結論：「宗道之評解《四書》，也為其後文人之《四書》評解提供了借鑒。晚明文人張岱受公安派影響甚大，其《四書遇》也以陽明學為本，且主張儒佛合一，以禪理陶冶儒經，宗道之影響宛然可見於其中。」〔註19〕

張岱的經學作品主要有《四書遇》、《明易》、《大易用》，除了《四書遇》近年被發現外，《明易》與《大易用》已亡佚了，而《瑯嬛文集》中尚留存有《大易用》序一文。因此欲明張岱的經學思想，只能從《四書遇》中著手，方能一探其經學特色與成就，以上兩點即為本論文寫作的動機與目的。

〔註15〕 朱宏達：《四書遇·前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頁9。

〔註16〕 見王夫之：《讀通鑑論》（臺北：里仁書局，1985年2月），頁594。

〔註17〕 見胡益民：《張岱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頁3。

〔註18〕 見胡益民：《張岱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何滿子序，頁2。其實張岱《四書遇》的特色與價值是超過李卓吾的《四書評》與袁宗道的《白蘇齋類集·說書類》中的《四書》學，關於這個部分請參本論文第五章〈四書遇的內容特色〉一文。

〔註19〕 周群：〈論袁宗道的四書詮釋〉，《中日四書詮釋傳統初探》（臺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8月），頁535。其實張岱的《四書遇》並沒有主張儒佛合一，而《四書遇》受袁宗道影響的地方則微乎其微，全書亦僅微引一則宗道的《四書》見解。相反的，則是受李卓吾與楊起元、張鼐等人的影響較多。關於這個部分請參考本論文第七章〈張岱四書遇與晚明四書學的關係〉。

二、歷來研究成果回顧

檢視前人對這個領域的研究，可說非常缺乏。在經學史方面，如皮錫瑞的《經學歷史》，馬宗霍的《中國經學史》等，講到明朝《四書》學的時候，只是幾筆帶過。而由林師慶彰所主編的《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12~1987）、《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88~1992）等所錄來看，近人對晚明《四書》學的研究，還是缺乏。學界目前關於晚明《四書》學的研究成果有羅永吉《四書蕩益解研究》〔註20〕、簡瑞銓《四書蕩益解研究》〔註21〕、吳伯曜《林兆恩四書正義研究》〔註22〕、陳昇輝《晚明論語學之儒佛會通思想研究》〔註23〕、陳孟君《李卓吾四書評與晚明新四書學》〔註24〕等篇，單篇論文有周群〈論袁宗道的四書詮釋〉〔註25〕、吳伯曜〈陽明學說對焦氏四書講錄的影響〉〔註26〕、〈陽明心學對晚明四書學的影響〉〔註27〕、朱宏達〈張岱四書遇的發現及其價值〉〔註28〕、黃俊傑〈張岱對古典儒學的解釋——以四書遇為中心〉〔註29〕等幾篇文章。

日人有關陽明後學這一部分之著作則有：佐野公治的《四書學史の研究》〔註30〕第五章介紹李卓吾《四書評》，而〈第六章晚明の四書學〉只介紹周汝登的《四書學》〔註31〕。荒木見悟的《明末思想研究》〔註32〕第十章專文探討葛寅亮的《四書湖

〔註20〕 羅永吉：《四書蕩益解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註21〕 簡瑞銓：《四書蕩益解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註22〕 吳伯曜：《林兆恩四書正義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註23〕 陳昇輝：《晚明論語學之儒佛會通思想研究》（臺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年）

〔註24〕 陳孟君：《李卓吾四書評與晚明新四書學》（南投：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

〔註25〕 周群〈論袁宗道的四書詮釋〉，《中日四書詮釋傳統初探》（下）（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8月）

〔註26〕 吳伯曜〈陽明學說對焦氏四書講錄的影響〉，《明代文學、思想與宗教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2005年）

〔註27〕 吳伯曜〈陽明心學對晚明四書學的影響〉，《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頁30~37。

〔註28〕 朱宏達〈張岱四書遇的發現及其價值〉，《杭州大學學報》第十五卷第一期（1985年3月），後來收入新校標點本《四書遇》（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成為該書之〈前言〉。本論文所據之版本即為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之刊本，此本也是目前市面上可見唯一流通之刊本。

〔註29〕 黃俊傑〈張岱對古典儒學的解釋——以四書遇為中心〉，《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

〔註30〕 佐野公治：《四書學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8年）

〔註31〕 探討周汝登的《四書》學著作包括《東越證學錄》與《四書宗旨》等二部。